

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功能检视与论证

——基于法官与当事人角色分配的思考

殷 雄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 上海 200063)

摘 要:多元化司法需求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案多人少”的司法困境日益凸显。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压力,其外在表现为运用司法裁量取代当事人的部分程序权利,牺牲部分“司法公正”以获取其他程序利益,但是这一做法却引发了对其本身必要性以及合理性的质疑。从繁简分流的理论价值和工具价值两个方面出发,在对法官与当事人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比例原则对其正当性问题进行论证。

关键词:繁简分流机制;供需失衡;比例原则;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D915.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20)01-0010-06

0 引言

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后,根据难易程度对案件进行筛选,进而交由对应的审判组织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的司法行为。这主要体现在立案阶段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庭前调解实现诉非分流,立案后通过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督促程序实现程序分流。无疑,在诉讼爆炸时代,有效的繁简分流机制将简案与繁案的诉讼程序进行剥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司法机关的压力,提升审判质效。但是,以追求效率为首要价值取向的繁简分流机制也引发了正当性质疑。

1 问题的提出

繁简分流旨在以合乎理性的规范使案件各入其道,使普通程序的正当化在司法资源与司法需求的剧烈冲突中获得现实可能性,努力以较小的司法成本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1]从现有的文献看,目前对繁简分流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繁简分流价值意义的阐释,大多从案多人少的现状、提升司法效率、回应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等方面肯定繁简分流的必要性;第二,关于司法实践中繁简分流具体形式的介绍,主要体现在各地法院的具体做法上,比如诉前调解、速裁及程序转换等方面的程序安排;第三,比较视野下的研究,将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民事审判管理制度横向比较,但很少涉及繁简分流的正当性问题。

中国民事诉讼存有“效率性高”和“公信力低”的悖论,其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司法的同时,也引发了极大的自身结构性矛盾。^[2]有学者认为繁简分流有悖于诉权的平等性,以“非正当手段”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致使其实现的程序简易化和平民化过于理想主义。在诉讼程序的诸多价值(主要是公正和效率)中,如果其中一项价值得到完全的实现,难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或者否定其他价值,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令人满意的确定这几种价值比例关系的绝对标准。^[3]

从案件管理的过程来看,对于繁简分流制度的质疑主要是关于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中是否实现了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问题,前者表现为繁简分流是法院内部的工作机制,当事人没有相应的程序参与权;后者表现为以效率为唯一价值取向的简易程序自身的正当性问题。将繁简分流制度置于整体司法语境中进行审视,目前关于繁简分流制度的质疑主要是对其制度本身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局限性的讨论。本文基于案件分流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的角色分配,对法官与当事人在程序推进或者“案件管理”中的相互关系进行说明,结合对于繁简分流机制的质疑,运用比例原则对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论证。

收稿日期:2019-07-27

基金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重大课题(ZCFYZDKT201808-05)

作者简介:殷雄(1997—),男,江苏宿迁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硕士生。

2 分流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的角色分配

在各地的司法实践改革中,繁简分流作为人民法院应对“案多人少”矛盾的一项重要司法举措,对外分流和内部分流是提升司法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关键系统。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与双方当事人相互间均负有诉讼促进的义务。^[3]从法院的角度看,繁简分流是为了解决“案多人少”问题,从当事人角度看,繁简分流是为了保障其“诉诸司法的权利”。本部分在对浙江省一家基层法院分流运行模式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进而对法官与当事人在程序推进或者“案件管理”中的相互关系进行说明。^[4]

2.1 基层法院分流运行模式介绍——以桐乡法院为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以及2017年颁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等规定,桐乡法院进行了一系列的繁简分流机制改革。

第一阶段。2017年10月,桐乡法院整合民一、民二、民三庭以及简案庭、行政庭的审判资源,设立简案部、繁案部两大部门。传统的民一、民二庭等仍旧存在,但是在功能上虚置。简案部以“调解为主、速裁先行”为理念,负责庭前调解、速裁各类简易民商事案件、诉调衔接机制建设。繁案部坚持“审判结合、审执兼顾”的原则,负责审理疑难复杂案件以及简案部分分流的案件,并开展调研指导等工作。

第二阶段。2018年6月,桐乡法院再次对审判业务部门进行整合,将立案庭、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简案庭、行政庭6个部门整合,拓展立案庭功能,将立案庭更名为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承担部分案件的审判职能,又新设民事审判庭、商事审判庭,行政庭承担部分民商事案件审判职责。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作为前道,统一对案件进行难易程度区分,除了以文件形式规定的应当直接由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或者分流至其他庭室审理的案件外,由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进行筛选,三日内完成,并进行分流。

第三阶段。2019年1月,桐乡法院对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案件分流比例做了新的规定,并以桐乡市内辖区为依据进行分割,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民事审判三庭及四个派出法庭审理所划定区域内的案件,并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做一定比例的分流。

桐乡法院繁简分流运行模式经历了上述三次调整,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对分流机制进行制度设计,繁案与简案的分流比例从一比九,到四比六,再到三比七。但是对于分流的具体操作方法、标准、流程问题没有进行规定,对于当事人是否享有程序选择权及其异议情况下救济的问题没有进行说明。在程序推进或者是案件管理中,法官仍然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作用微乎其微,引发了对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设计的合理性、可行性问题的质疑。

2.2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案件管理中的作用

法院司法管理系统是以对外独立和对内分权为基础,围绕审判权的行使及资源分配为中心的管理体系。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和当事人均负有诉讼促进义务,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系统属于司法内部管理的一部分,也体现着法官与当事人的相互关系。在我国案件管理体系中,法官是管理者,当事人是被管理者,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作用发挥非常有限,甚至于诉讼效率的提升是以相应减损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为代价,缺乏正当性基础。

(1)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缺失。程序选择权最早由台湾学者邱联恭提出,他认为法律应肯定当事人有提起适时、适式审判的权利,在无害于公益的情况下,当事人应当享有程序选择权。^[5]换言之,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在诉讼过程中选择有关程序及程序有关事项的权利。^[6]程序选择权的行使范围广泛,大致可以分为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当事人合意选择纠纷解决的程序、选择管辖法院三个部分。^[7]

我国法律目前尚无“程序选择权”概念,但在一些条文中可见其思想内涵。比如关于纠纷解决方式,当事人可以选择诉讼、仲裁或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可见《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仲裁法》第二条、《人民调解法》第十七条。这些规定表明,当事人对于其面临的民事纠纷可以自主选择解决方式。但是,在案件繁简分流实践中,程序选择权实际掌握在法院手里。一方面,程序适用由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确定,诉讼中能否转换也取决于承办法官,而法院多做利己处理,当事人难以进行自由选择;另一方面,正因为繁简分流的正当性

基础并不完善,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等简化程序的适用被认为减损了程序的公正价值。

(2)诉讼代理人程序参与能力薄弱。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其中具有指导意义的是第一条中表述——“根据案件事实、法律适用、法律影响,选择适用适当的审理程序”,这里的“选择”主体未明,但是根据体系解释应当是法院,法院对于案件进行繁简分流,选择不同的程序。

第二十一条要求发挥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积极支持律师依法执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重视律师对案件繁简分流和诉讼程序选择的意见,积极推动律师参与调解、代理申诉等工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律师难以发挥上述作用。在西方的审判管理实践中,律师对于民事诉讼程序的日常运作的作用较大,而我国律师实际性作用和当事人并无大的区别。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围绕“案件管理”或者程序推进的互动关系中,诉讼代理人(律师)的角色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3 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正当性问题的质疑

繁简分流机制的运营理念在于以理性的规范缓解司法资源和司法需求之间的冲突,运用司法裁量取代当事人的部分程序权利,牺牲部分“司法公正”以获取其他程序利益。李少平认为,人民法院在推进繁简分流过程中,应当充分注意到公正与效率在司法领域的价值取向有别于经济领域,要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追求司法效率。^[8]简化程序则意味着诉讼权利某种程度的减损,因此,简化程序必须引入当事人弃权或者经得当事人同意来确保正当性。^[9]

3.1 繁简分流的观念价值是否得以实现

最高人民法院在此轮司法体制改革整体方案中提出的“繁简分流”机制改革,其观念价值包括“司法公正优先”“司法效率兼顾”“诉讼程序正当”“审判组织合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关于繁简分流和司法公正的问题,一方面,当事人往往“被迫”参与诉前调解,有违自愿原则。同时,繁简分流工作通常是法院立案庭内部的工作流程,当事人难以参与其中。尤其是基层司法中较为普遍的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化和普通程序简易化的现象,部分当事人内心并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意愿,但是无法选择。当事人无法参与繁简分流运行机制,也就无法保障其程序参与权。换言之,当程序成为当事人被动接受的制度设置时,复杂程序和简易程序同样都是强加于当事人的“义务”而非“权利”。^[10]对司法过程的质疑本质上是对繁简分流的形式合理性的质疑,按照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当事人在程序中的享有绝对处分权。另一方面,超负荷的基层法院采取的简易程序扩大化问题超越了法律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以降低司法职业水准和司法程序技术含量的非规范程序模式审理第一审案件,固然大幅提高了案件审理速度,但是却引发了“效率高”而“公信力低”的悖论现象。

3.2 繁简分流的工具价值是否得以实现

“繁简分流”的概念是伴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始探索的案件分流实践出现的,旨在解决多元化司法需求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其工具价值亦包括四个方面: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矛盾;促进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备;提升国家治理能力。^[11]将繁简分流机制置于整体司法语境中进行审视,目前关于繁简分流机制工具价值的质疑主要是落脚于其制度本身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诉讼是通过程序实现正义的,简易程序具有的灵活性特征使其程序本身出现了不确定性,而这是与传统法治理论相悖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案多人少”问题的真伪,究竟是“案多人少”还是“事多人少”?非司法职能负担主要表现为非司法目标的嵌入使得个案处理难度的加大,以及对司法自身专业与独立属性不同程度的扭曲,案多人少之所以广受关注,实际上是内在地包含这个因素的,只是质疑的声音仅仅注意到了案件负担这个方面。^[12]二是繁简分流机制增加而非减少了法院负担。首先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不足,短时间内难以获得民众信赖并方便其适用,多元化解纷机制的运行会增加法院的人力成本和管理事务;其次是诉讼程序内分流的标准模糊,诉讼程序转换耗费较高成本。三是简易程序扩大化和普通程序简易化的问题。超负荷的基层法院容易出现上述现象,部分当事人内心并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意愿,但是无法选择。

现代的民事案件管理注重加强法官职权,弱化当事人的自主性和参与性。如前所述,桐乡法院三次繁简分流运行模式调整均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对分流机制进行制度设计,从实务上看确实有效促进了案件管理,但是在法理上却没有很好地实现当事人自主与法官职权在程序控制中的动态均衡。当前对于繁简分流运行机制的正当性质疑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即繁简分流机制的理念价值和工具价值是否得以实现的问题。而在诸多价值里,譬如上文谈到的关于繁简分流机制的必要性、有效性问题,已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论述,其反映出的问题也并非不可克服,实质上也并不是导致繁简分流机制受到正当性质疑的根本原因。繁简分流原旨是以“接近正义”为法哲学基础,依据程序的“利益衡量标准”,以最小的侵害或者干预最少数人的权利,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换言之,繁简分流实际上是以限制甚至取消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来获得效率,故对于繁简分流运行机制正当性最大的质疑便是牺牲当事人部分程序权益(程序选择权)或者“司法公正”的行为是否正当。

4 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法理基础

西方国家将接近正义运动视为案件管理改革的哲学基础,其内涵为通过民事司法制度使社会成员能够轻松便利地利用司法,合理、迅速且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司法需求。从整体利益衡量出发,对诉讼机制进行技术调整。民事诉讼比例性的本质在于运用利益衡量的思维,在司法程序、政策及适用方面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统一。比例原则包含三项子原则,分别为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适当性要求国家的公权力行为必须切合其预期目的,限制当事人部分程序权益必须有助于政策目的达成;必要性要求限制当事人程序权益时,尽可能选择损害最小的方式;均衡性要求国家公权力手段所欲达成目的之公共利益与公共主体使用的手段所牺牲的人民权利的损失不可显失平衡。^[13]三者之间具有递进关系,总而言之,民事诉讼比例性要求民事诉讼及其具体程序制度目的与其实现手段之间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14]

4.1 繁简分流机制的适当性考量

通常认为,诉讼拖延、较高诉讼成本以及繁杂的诉讼程序规则使群众的司法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有碍于接近正义目标的实现,进而赋予了人民法院推动“分调裁审”机制改革的必要性。因此,关于繁简分流机制是否适当的问题则落脚在其机制运行是否有助于解决多元化司法需求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1)繁简分流机制对“案多人少”问题的缓解。司法作为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途径,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一直在持续不断增长,《四五改革纲要》确立的员额制改革意味着法官数量的进一步缩减,虽然旨在促进法官队伍的专业化,但同时也造成了短期内案件受理量与法官数量比例配置不均衡的现实状况。针对愈发严重的人案矛盾,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繁简分流机制改革是顺应改革趋势、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选择。通过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构建出一套立体化、多元化、精细化的诉讼程序体系,从而实现源头解纷、分流提速、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目标。

(2)繁简分流机制对“接近正义”目标的促进。西方国家将“接近正义”视为案件管理改革的法哲学基础,接近正义是指使社会成员能够便利地利用司法,并能使得各种法律需求得到合理、迅速并且有效的解决。^[15]繁简分流的目的在于使繁简案件各入其道,从细节上审慎设计制度和程序,采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分流案件、遏制诉讼,实现公民接近正义的司法期待。^[16]目前,繁简分流机制的前提及重心应当是繁案与简案的程序性评估,繁简案件的识别是保证法院诉讼程序适用正当性,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益平衡的基础。调研发现,各地法院均在不断探索高效的繁简分案方式以提升人案资源充分适配。案件类型、争议标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均被作为繁简分案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时在司法过程中不断动态调整繁简案件识别标准。因此,繁简分流机制的合理设计和适用并不必然以损害司法正当性为代价,符合接近正义目标。

4.2 繁简分流机制的必要性考量

基于案多人少的司法现状,繁简分流的实质在于运用司法裁量取代当事人的部分程序权利,牺牲部分“司法公正”以获取“司法效率”。必要性原则要求限制当事人程序权益时,尽可能选择损害最小的方式,即面临多元化司法需求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司法供给侧改革是否为最佳的选择。

(1)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符合司法趋势和规律。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各国针对诉讼拖延与诉讼成本问题而陆续开展以强化法官职权、弱化当事人自主性和主导性为主要内容“案件管理运动”。譬如,美国率先推

行了管理型法官制度,英国创设案件管理制度,明确提出将传统上由当事人及其律师承担的案件管理责任移交给法院,通过案件管理等新举措来缓解诉讼拖延与诉讼成本过大等民事司法症结。德国采用“斯图加特模式”,实现向集中审理、口头审理、分阶段审理等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由此分别形成了英美法系的管理型司法和大陆法系的集约化审理两种模式。因此,繁简分流机制改革顺应了全球司法改革趋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持续深化繁简分流机制改革,健全满足群众需求的纠纷解决新模式,是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选择。

(2)司法供给侧改革促进手段和目的相匹配。为缓解法院当前案多人少的矛盾,即司法资源供需失衡,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增加司法资源,加大审判资源投入;二是抑制司法需求,提高诉讼门槛。但是这两种方式均缺乏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一方面,为消除司法资源供不应求的现状,最简易的方式是增加司法资源,扩充法院人员编制和扩充法官人数。但是,法院应当是“专业”解纷机构,而非“专门”解纷机构,员额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法官的整体数量,却立足于法官队伍的精英化、专业化建设。同时,人员增加而带来的科层制管理的增强,不利于司法独立性。另一方面,通过提高诉讼门槛来抑制司法需求亦不具有合理性,即使能够有效降低司法需求,却不利于将诉讼从有产阶级的独占中解放出来,成为向一般民众提供的大众服务,有违公平正义理念。^[7]因此,简单的扩充司法资源供给或者抑制司法需求绝非理性的选择,司法改革应当探索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合理优化配置审判资源,提高审判质效。^[8]而繁简分流机制设计之初的价值定位,即在于解决司法资源有限性和群众需求多元化之间的问题。

4.3 繁简分流机制的均衡性考量

繁简分流机制价值定位在于解决司法资源有限性和群众需求多元化之间的问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当事人作为程序主体地位所享有的程序参与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能是对当事人抽象诉权的侵犯。均衡性原则要求国家公权力手段所欲达成目的之公共利益与公共主体使用的手段所牺牲的人民权利的损失不可显失平衡。

(1)分流中法官与当事人的角色分析。关于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一相对的概念,如果某一价值得到完全的实现,难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或者否定另一个价值,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令人满意的确定这几种价值比例关系的绝对标准。诉讼民主与平等的司法理念要求程序设计以当事人为中心,尊重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繁简分流机制的价值定位在于解决“案多人少”问题,进而保障当事人“诉诸司法的权利”,需要体现更多“简”的一面。因此,需要在适用简化程序前引入当事人弃权或者经得当事人同意来确保正当性,同时还要处理好衔接机制中的法律技术难题。通过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权限配置,从司法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要求出发,兼顾法官程序管理职权与当事人诉讼自主权的平衡。

(2)私益受损与公益增进的程度相称。繁简分流实际上是以限制甚至取消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来获得效率,以最小的侵害或者干预最少多数人的权利,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合理分配司法资源,使不同案件获取不同的程序保障,从而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根据均衡性原则,与繁简分流机制想要实现的目的相比,其设置和运作不得产生更大的弊害。换言之,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运行应当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以保证实现司法目的之手段不会给当事人和国家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繁简分流机制遵循了整体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对诉讼机制进行全局调整,在保障诉讼公正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节约当事人和国家的诉讼成本,使用于解决争议的程序与案件的价值、重要性和复杂性成合理比例。因此,随着“分调裁审”机制进一步地深化改革,将建构出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诉讼程序体系,以确保不同繁简程度的案件分流到最适宜的诉讼程序之中,进而为当事人提供最能体现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裁判结果,满足不同当事人的司法需求。因此,即使繁简分流对当事人部分程序权益造成了损害,在保障获得当事人程序参与权的基础上,努力使其与实现的公益价值相匹配,符合均衡性原则的要求。

5 结束语

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所有民事诉讼机制不可回避的中心问题。不同当事人对于不同案件存有不同司法需求,针对简易案件,当事人追求高效、及时、低成本;针对复杂案件,当事人追求精细化审

理,且愿意付出高成本。对于繁简分流机制而言,专业化较高的诉讼程序虽然有助于生产出更高质量的司法产品,但也意味着诉讼迟延和当事人接近司法的难度加大。其所体现的差别司法赋予平等以具体含义,通过司法的过程性改革,为当事人提供诉讼实质平等,实现以较小的司法成本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更符合接近正义要求。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由法官行使程序管理权来促进案件的分流和集中化审理,从而保障程序公正、有效、迅速的进行,是最佳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傅郁林,兰姆寇·凡瑞.中欧民事审判管理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34-40.
- [2]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6.
- [3]沈冠伶.民事诉讼之适时审判与案件管理[J].台大法学论丛,2010(2):50-54.
- [4]范婷贤.T市法院繁简分流运行情况与启示[N].上海法治报,2019-9-3(3).
- [5]邱联恭.程序选择权论[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2001:78.
- [6]左卫民,谢鸿飞.论民事程序选择权[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8(6):48-64.
- [7]彭世忠.程序选择权及其法经济学思考[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6):14-18.
- [8]李少平.大力推进繁简分流全面深化司法改革[N].人民法院报,2016-09-14(5).
- [9]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J].法学研究,2016(4):79-98.
- [10]傅郁林.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J].法学研究,2003(1):50-63.
- [11]邵新.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繁简分流的法理论证[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4):115-135.
- [12]姜峰.法院“案多人少”与国家治道变革——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与司法忧思[J].政法论坛,2015(3):25-37.
- [13]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01.
- [14]占善刚,张博.比例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与展开[J].学习与实践,2019(1):76-85.
- [15]王福华.民事案件管理制度评析[J].法学论坛,2008(2):71-78.
- [16]范愉.司法资源供求失衡的悖论与对策——以小额诉讼为切入点[J].法律适用,2011(3):14-19.
- [17]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01-120.
- [18]万涛.员额制背景下审判资源有效配置研究[J].福建法学,2009(1):67-74.

(责任编辑:范可旭)

Functional Inspec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Separating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 into Simple and Complicated Ones

—Consideration Based on the Role Assignment Between Judges and Litigants

YIN Xiong

(School of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63, China)

Abstrac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iversified judicial needs and limited judicial resources makes the judicial plight of “more cases and fewer peopl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mechanism of separating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 into simple and complicated ones has alleviated judicial pressure to a certain extent. Its external performances are to use judicial discretion to replace some of the litigants’ procedural rights, and sacrifice part of the “judicial justice” to obtain other procedural benefits, but this practice has triggered queries about its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Starting from the idea value and tool value of separating cases into simple and complicated ones,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ges and litigants, it applie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to demonstrate its legitimacy.

Key words: mechanism of separating cases into simple and complicated ones;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legitimacy